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夏晓虹 编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

上

梁启超文选



83.3.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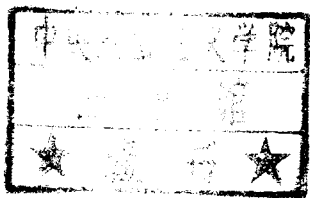
I 213.
6



梁启超文选

(上 集)

夏晓虹 编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梁启超文选

(上 集)

夏晓虹 编

沈楚瑾 责任编辑

李 萌 封面设计

张智勇 版式设计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20.625 印张 404(千)字

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100 册 定价:12.00 元

ISBN 7-5043-1574-5/I·141

(京)新登字 097 号



梁启超像（1899年）

前山後山
 石山園鹿
 以重教
 變化
 自免
 為中丁
 一拾
 沐洪
 日又

《饮冰室文集》自序手迹

· 编者前言 ·

在近、现代之交的中国，梁启超不但名气相当大，而且享名时间长，这在那个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三、五年”的时代，实属难得。

善于自我剖析的梁启超晚年曾向公众表白：“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；两样比较，学问兴味更为浓些。我常常梦想能毅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，容我专作学者生涯。但又常常感觉：我若不管政治，便是我逃避责任。”在两种互相冲突、各不相让的兴趣左右与吸引下，梁启超的行动不免彷徨犹疑，视外界形势的变化，而或此或彼，偏重一端；但其内心深处，却始终期望“鱼”与“熊掌”两味兼得，故其人生的最高理想是，“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”（《外交软？内政软？》）。且不论政治家与学者这两种社会角色是否可以同时扮演得同样出色，倒是政治兴味与学问兴味的矛盾调适，确是梁启超成名早而又得名久的重要原因。

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维新派，其当然的精神领袖为康有为。在他随后发起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，梁启

超初时不过是作为一名康门弟子随师奔走，宣传康氏的主张。而一旦《时务报》于1896年创刊，他有幸出任该报主笔，便如鱼得水，即刻脱颖而出，显示了其以文字鼓动人心的特殊才干。系列政论文《变法通议》以明白畅达的语言，痛快淋漓地论述了变法势在必行的道理：“法者天下之公器也，变者天下之公理也。”当今之势，是“变亦变，不变亦变”。主动变法，实为“保国”“保种”最明智的选择（《论不变法之害》）。其时，梁启超的思想基本源于康有为，而他以报刊政论家身份所发表的言论，却使其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更为普遍。因而一时间声名鹊起，康、梁并称，造成了在维新运动中，梁氏几与其师平分秋色的态势。

戊戌以前，梁启超对康有为的称扬可谓不遗余力，而政变发生、亡命日本后，他受到现实的刺激——变法失败的打击与日本明治文化的冲击——“思想为之一变”，渐有与康氏分离的倾向。在1898年底于日本横滨创办的《清议报》中，尽管仍接刊《变法通议》的续论二篇，但梁启超思考的中心已不局限于对维新活动本身的检讨，而推及政变发生的远因。1901年发表的《中国积弱溯源论》，其栏目标题为“中国近十年史论”，原拟著成一书，对1894年中日战争以来的历史作一总体清理。首章《积弱溯源论》便放大视阈，对影响近代中国的思想、风俗、政治以及清代史事各种积因逐一阐发，开始关注国民性问题。批判国民性这一思路，在长达十余万言的《新民说》中得到了集中、充分的展现。认识到“国也者积民而成”，“欲其国之安富尊荣，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”（《叙论》），梁启超已从痛恨

顽固派守旧不变，扼杀新政，转而深入探讨更为基本的国民教育问题。通过对国民性的历史批判，倡导培养新国民必备的种种品德，而其最终期望，仍在“有新民，何患无新制度，无新政府，无新国家”（《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》）。本着这一“开通民智”的新意识，梁启超此时的政论表现出更多责望于国民而不是政府的取向。比较传统的“贤人政治”理想，这应当被视为一种进步。而他于《新民说》中曾力加鼓吹的破坏主义，也应和了革命思潮的传播，引起持君主立宪、保皇改良主张的康有为的不满。“新民”理论的系统阐释，证明梁启超已具有对社会舆论独立发生影响的实力。而连载于1902年创刊的《新民丛报》上的《新民说》及其它以“新民”为主旨的论文，也为梁启超赢得了极高的声誉。他的开始于办报活动的政治生涯，在此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。

1903年以后，康有为的影响再度显现。游历美洲的经历，使梁启超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和民主制国家颇为失望，考察旅美华人社会的结果，也使他对国民性改造倍感艰难，因此放弃革命、破坏主张，改为宣扬“开明专制论”。而溯其思想转变的伏脉，却与“新民”理论不无关系：国民素质低，固不足以谈革命；而国民觉悟的提高，又有赖于开明君主的干涉、指导。这种议论，与革命派以革命开民智的说法截然对立。由于“新民”理论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保守性，使得国民性改造问题很快退居其次，被更为紧迫而引人注目的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所取代。同时，梁启超在舆论界的号召力也大为下降。

民国成立，梁启超结束了流亡生活，回到国内。与康有为

不同，他并不固执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，而以承认现存国体、谋求改良政体为依据，对共和制度取认可态度。其后，他又以同样的理由，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、币制局总裁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，并积极参与了倒袁运动及讨伐张勋复辟之役，在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完全分道扬镳。虽勉力于政治事务，比前此以报刊鼓吹政见更切近实际，然而，“理论的政治家”作为“实行的政务家”原未必合格。梁启超殚精竭力，可还是发现对于政务家的角色，他并不能胜任。于是，1917年底，他明智地退出了政界，结束了因之成名的政治生涯。

其实，即使在以政论家活动声名最盛的时期，梁启超也始终不曾忘情于学术。少年时代在广州学海堂所接受的旧学训练，一度令其“不知天地间于训诂、词章之外，更有所谓学也”（《三十自述》）。对于国学的兴趣由此培植，并且从未因其后的“舍去旧学”、趋向新学或干政从政而泯灭。一俟政治活动中稍有闲暇，梁启超的治学欲望便不可遏抑地生发。1901年作《中国史叙论》，原是有意撰写一部《中国通史》，然而时势动荡，牵虑政局，梁启超终无余力静心完成这一长篇史著。至1902年写作《新民说》，从历史的深处抉发国民性病源时，对中国旧学的清算也以极大声势展开。《新史学》接续着《中国史叙论》以国民史取代帝王史的思绪，批判旧史学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”，“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”，“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”，“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”，提出新史学的职志，为“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，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”（《中国之旧史学》、《史学之界说》）。在对旧学的重镇——史学进行改造的同时，梁启

超还融合西学,以“二十世纪,则两文明(按:指东、西文明)结婚之时代也”的先进眼光,重新阐述与评估中国学术传统,著作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,为新史学品格的建立提供了范式。不难看出,梁启超此期的学术研究,带有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。《新史学》与《新民说》的互相呼应一目了然;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也与其介绍西方学术、思想的诸多论文用心一致,均在求引进西学,融贯中外,催生中国新文明,放大光华于世界,用梁启超的妙喻,即是:“彼西方美人,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。”(《总论》)其间,最近乎纯学术的著述计划当为《中国通史》,不过,据梁氏自白,其立意也在“助爱国思想之发达”(《三十自述》)。因此,为经世而治学,是政治活动家梁启超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倾向。

以学问为改良政治的手段既被视作理所当然,为学问而学问自然心中不安,偶一涉足,梁启超不免自讼为“玩物丧志”,自觉愧对“国方多难”之时局(《国文语原解·序》)。这种学者型政治家内心矛盾的表露,恰恰证明了学术研究还该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。归国之初的梁启超在对大学生发表演说时,即已劝导他们“以学问为目的,不当以学问为手段”,理由是“学问为神圣之事业”,“若于学问目的之外,别有他种目的,则读学问之神圣”(《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》)。这可以表见暂时脱离政事干扰的梁启超向往学术独立的真实心态。然而,政治兴味甚浓的梁氏,很快又因卷入党派活动而步入政坛,从政论家出为政务家,公文丛集,公事缠身,更无余暇进行完整的学术著述。若仅以此政绩,梁启超殊不足以留大名于现

代史。

幸好，于政治宣传之外，梁氏还别有所长。辞去政府职务后，他即埋首于蓄志已久的《中国通史》写作，数月后虽因病中辍，而积稿已十余万言。1918年底出游欧洲，历时一年余。归国当年，便以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的撰写与面世为标志，显示了其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。放弃政治活动，专心研治国学，这一人生路向的转换，也是梁启超重新对社会发生普泛影响的契机。尽管仍不免就时事发表意见，他却谨守社会名人的身份与更为超脱的姿态，倡导国民运动，抨击时弊恶行。更多的时间与精力，则投入著述与讲学，并且一发而不可收，新作迭出，方面广博。如诸子学、清学、佛学、文学，此时均作过专门研究，其中尤以史学为大宗。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，梁启超后期的学术论著，大致是前期著述时代研究的加深与放大（《梁任公先生》）。而时间余裕，雄心勃勃的梁启超因此又筹划着大型撰著。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之标为“中国学术史第五种”，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之题以“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”，都是拟议中的宏大工程留下的遗迹。与《中国学术史》同年开笔的《中国佛教史》与《国学小史》，则成品更少。由于兴趣广泛且容易转移，梁启超迅速成型的这些计划又每每轻易放弃，使我们今日只能从个别枝节及全书目录来拟想其规模与气魄，因而发出惊叹与感到惋惜。

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治学路数，已与传统学者有了很大不同。重视系统性与总体把握，使其研究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、烦琐的狭小格局，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。科

学性也得到突出强调。在《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》一文中，梁启超为“科学精神”所作的解说是“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”，并据此批评中国旧学界的“笼统”、“武断”、“虚伪”、“因袭”、“散失”违背了科学的要求，希望以近代西方的良药医治中国的痼疾，正反映了这种意识的自觉。其论著中的下定义、用推理、作判断，在追求科学化的同时，也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。梁启超不仅自己做研究讲究方法的运用，如以问题、时代、宗派三种研究法的交叉使用为其学术史撰著的基本法则，而且诲人不倦，喜欢向人传授治学之道。凡此种种，均有益于新型学风的建设与普及。

虽然不再以学干政，而推崇“无所为而为”的治学精神，梁启超其实并非毫无功利的打算，只是不汲汲于现时的效应而已。与倾力从事国民教育的主旨相同，梁启超此时关心的是国民品格的培养，这自然是“新民”课题在现代的沿续。不过，也有不同：前时重在批判，此刻重在表彰；前时取法西方，此刻取法传统。在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中，梁启超明确将国学研究区分为“文献的学问”与“德性的学问”两类，并且凡语及治学，无不兼及道德修养。即使是以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之名印行的专门论著，他也不忘附加上《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》的标题，以示别有会心。因而，梁启超此期的学术研究，实可称为“为人生而学问”。他这些与人生不即不离而又具有现代精神、新意浚发、纲目清朗的著述与讲学，便易于在五四以后的知识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引起共鸣，从而名声大振。

概括而言，因政治活动而得名，以学术生涯而葆名，便是

梁启超的成功之路。并且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去掉任何一方，梁启超的知名度都会大打折扣。

还应当指出的是，梁氏独特的文风，也有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。他在戊戌东渡日本以后创造的“新文体”，“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，纵笔所至不检束”，“条理明晰，笔锋常带情感”，因此对于当时的读者，“别有一种魔力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。这种夹杂大量新名词、无所顾忌的采择众多文体（诸如古文、辞赋、骈文、佛典、语录、八股文、翻译文）的字法句式语调融合形成的新型散文，是对于传统古体文的极大解放。而其最著名的代表作，即为《少年中国说》。该文首先反复对比老年人与少年人种种对立的性格，并以“老年人如夕照，少年人如朝阳”一连九对同类比喻加以强调，最后又气势磅礴地用“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；河出伏流，一泻汪洋”一段韵文结束，其鼓荡人心特别是热血青年的感召力，便从密集排列的对比句与铿锵有力的节奏中产生。尽管“新文体”带有铺张过度、重叠拖沓、情感刺激过于频繁等明显的毛病，但这些宣传西学、别具一格、热情洋溢的文章，对当时向往新思想、新知识的知识分子，仍具有巨大吸引力。“新文体”之成为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模仿者最多的文体，也是梁启超的文风笼盖社会的明证。

五四文学革命以后，白话文成为社会通行的文体，随时进步的梁启超也抛弃“新文体”，改用这一现代的文字工具。1920年刊出的《欧游心影录》，即是用相当漂亮、流畅的语体文写成。其后大量发表的讲演稿，更是极为生动、传神的口语的摹

写。即使在写作学术论文时，梁启超的白话文仍有独特的魅力。它的文字尽管平实，却因与其学术通俗化的学风水乳交融，而能够深入浅出，举重若轻，给人以自由如意的轻松舒畅感。

实在说来，无论问政、述学，也无论治事、行文，统贯梁启超一生的精神追求始终不离乎“开通民智”。报刊政论家心中的读者大众，大学院导师面对的莘莘学子，都与古雅深奥的高头讲章相抵牾。对民众发言的意识既经确立，梁氏前期的介绍西学，倡导政治改良，以及后期的研治国学，促进教育普及，便都在内容与表述的通俗易懂上用力。他为人诟病的肤浅、粗疏，未尝不缘于此；而其广受社会欢迎，知名度居高不下，很大程度也得益于这种努力。

梁启超逝去虽已半个多世纪，他生前探讨的诸多问题，在今日却并未过时，且仍然令人关注。因此，从卷帙浩繁的梁氏著作中撷取有价值的篇章，汇为一编，供现代人阅读、回味，以期引发深入、继续的思考，便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。本着兼顾文化史意义与文学欣赏趣味的准则，将梁启超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择其精要，分类编排，力求窥一斑而知全豹，读其文而知其人，是本文选的努力目标。

入选文章分为十一类，类别顺序及每类文章的排列先后，均大体依照撰写年代以次编定。如以“时论编”居首，“文化编”殿后，便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前后期关注重心的转移。

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，遗留世间的文字总数约为一千四百多万言，可谓著作等身。其生前、死后曾出版过多种文集，收集

最丰的为中华书局 1936 年初版的《饮冰室合集》四十册，然而也非全编。此书虽有集大成之长，却也不无瑕疵。以收入的文章而论，有些版本选择不当，校勘不精，并且为求体例的一致，五四以后使用新式标点文章，也一律改成旧式句读，便是其中最可訾议之处。此次选编，尽量使用较早的版本为底本，与《饮冰室合集》对勘；入选文章，均经标点，原有标点者，只作少量校改，大体保持原样；除个别文章增加了段落划分，基本未加变动。考虑到本书为面向普通读者的通行本，故明显的错字已经行改正，另有拟改之字，以□标出，拟补之字，以（）标出。因梁启超行文中征引前人诗文，常凭记忆，故每多讹误。有些收入《合集》的文字已作过校改，有些则仍保持初稿原貌。一般不致误会原意的，不作改正；而出入较大的，则据引用本校出。如《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》末二节，未在杂志上刊出，編集时也没能如前八节一般进行校订，错字较多，因此作了集中勘误。每篇文章后面，均注明已知最初的发表时间及出处，个别未审原刊处或完稿后隔年出版者，均标出写作时间。

着手编选时，以为费时无多；深入其中，方觉大非易事。初版本的寻觅、借阅困难，逐字校对，以及由引文而生出的额外校勘，都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。也想省点事，降低标准，又觉得对不起读者，也对不起自己。在长夏溽暑之中，总算编完了这几十万字，虽仍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，但自问是尽了力了。

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日于京西畅春园

《饮冰室文集》自序

擎一编余数年来所为文，将汇而布之。余曰：恶，恶可！吾辈之为文，岂其欲藏之名山，俟诸百世之后也，应于时势，发其胸中所欲言。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，转瞬之间，悉为刍狗。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，如转巨石于危崖，变异之速，匪翼可喻。今日一年之变，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。故今之为文，只能以被之报章，供一岁数月之遭铎而已，过其时，则以覆瓿焉可也。虽泰西鸿哲之著述，皆当以此法读之。而况乎末学肤受如鄙人者，偶有论述，不过演师友之口说，拾西哲之余唾，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。而世之君子，或奖借之，谬以厕于作者之林，非直鄙人之惭，抑亦一国之耻也。昔扬子云每著一篇，悔其少作。若鄙人者，无藏山传后之志，行吾心之所安，固靡所云悔。虽然，以吾数年来之思想，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。每数月前之文，阅数月后读之，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；况乃丙申、丁酉间之作，至今偶一检视，辄欲作呕，否亦汗流浹背矣。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，亦当若是，乌可复以此戔戔者为梨枣劫也！擎一曰：“虽然，先生之文公于世者，抑已大半矣。纵

自以为不可，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，亦既不可得削，不可得洒，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。中国之进步亦缓矣，先生所谓刍狗者，岂遂不足以为此数年之用？而零篇断简，散见报纸，或欲求而未得见，或既见而不获存，国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。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，欲普及思想，为国民前途有所尽也。使天下学者多憾，天柱等实尸其咎矣，亦岂先生之志哉？”余重违其言，且自念最录此以比较数年来思想之进退，用此自鞭策，计亦良得，遂颌焉。擎一乞自序，草此归之。西哲恒言：“谬见者，真理之母也。”是编或亦可为他日新学界真理之母乎？吾以是解嘲。

壬寅十月，梁启超。

（1902年11月作，原刊何擎一编《饮冰室文集》，
广智书局1903年3月初版）